



李存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一级文学创作。著有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散文集《大河遗梦》《最后的野象谷》《飘逝的绝唱》《绿色天书》等。其小说译有英、美、法、日、俄等国外文版本。作品曾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等。电影文学剧本《高山下的花环》获全国第五届电影金鸡奖及最佳编剧奖，《百年老屋》获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等。

呼伦贝尔记忆

□ 李存葆

—

人类的记忆常是文化的记忆，人类的历史也靠文化的链环得以衔接和赓续。

由拓跋鲜卑氏开创的北魏王朝，离我们已十分遥远了，整个鲜卑族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度里，也早已失却了席位。然而，这个隐遁于历史深处的民族，似乎又距我们很近很近。今天，当人们在淮水以北的大半个中国旅行，徜徉于锦山秀水间的时候，会常常与北魏王朝不期而遇。它那斑斓多彩的历史衣袂，常常会飘忽在人们的眼前。

北魏时在其辽阔的疆域内，曾有着三万余处梵宫佛寺，石窟、石刻、碑铭，更是不可数计。历经战乱、兵燹和风剥雨蚀，而侥幸逃脱岁月磨难的北朝古迹虽多有损毁，但今人仍可藉这些文化遗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胡风汉制，崇佛

尚道尊孔。信仰是精神的劳动，信仰是人类认识自己智慧的结晶。当这智慧的劳动转化为有形有色有彩有声的辉煌艺术品时，便成了一个民族心灵之树上结出的文化圣果。

在生我养我的齐鲁，于南北朝时，曾是拓跋王朝的辖域。北朝文化的流风遗韵，越一千五百余载，代代相延，迄今仍在山东大地上袅袅不绝。

文化名城青州市驼山下的龙兴寺，因规模宏大气势非凡而向有“九州佛国”之誉。1996年，在驼山开掘出的四百八十余尊北魏佛教造像，被列为中国该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首。傍依云门山的玲珑山，因有了北魏书法宗师郑道昭的摩崖石刻，而益发玲珑剔透。我每到青州访古，总感到鲜卑人播种斯文、耕耘风雅遗留下的文化浓香，仍弥散于林泉之下，缭绕于白云之巅。

位于胶东半岛的莱州市和平度市，山河雕丽，阡陌如绣。莱州的文峰山、大基山，平度的天柱山，也因有了郑道昭的碑刻及

多处摩崖石刻,而名重域内海外。郑公之书法,被奉为“隶楷之极”,在中国书法史上,向有南王(羲之)北郑之誉。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文物部门饬令对文峰山下的郑碑严加保护。此碑早已被玻璃密封罩盖,上系铜锁数把,钥匙由数个部门分掌。即使当今国内顶尖级的书画大家,欲以自己的巨幅精品换此碑拓片一张,也已万万不能了。国内外游客欲一睹此碑芳容,只能凭栏凝睇。

在南北朝时,中国的五岳,除南岳衡山外,均为北朝领地。西岳华山之上始建于北魏的崔嵬宏伟、飞檐点金的西岳庙,至今仍是华山第一大佛寺。腾誉世界的中岳嵩山少林寺,也是拓跋鲜卑的原创。悬于刀削般悬崖上的北岳恒山悬空寺,以建筑的“奇、险、巧”著称于世,北魏人将力学、美学、宗教精妙地融为一体,在其“三教殿”中,鲜卑人让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并排端坐,让儒释道三教的祖师同居一室。面对此寺,今人不得不惊叹北魏人天才的构想,超拔的设计。

五岳之尊的泰山,是一座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院”。鲜卑族统治时的北朝,在这架文化之山上,也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北魏法师僧意在此创建的玉泉寺,至今仍是晨钟暮鼓,香火氤氲。泰山的道家圣地岱岳观,也为北魏所建,道家音乐也是北魏所创。至今仍有众多游客来岱岳观求签问卜,圆梦起课,禳灾驱魔。

郭沫若曾说,泰山是中国历代书法的展览馆。泰山上的碑铭、石刻多达六千余处,其中以仅存九个半字的《李斯碑》和经石峪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石刻最为著名。经石峪石刻,镌于斗母宫东北一公里处的花岗岩溪床上。现存一〇六七字,南北长五十六米,东西宽三十六米,每字之大,在百米上下,蔚为壮观。凡书画当观韵。抑或

是为让石刻起到“溪中生花”之妙,原创人将经文刻于清澈可鉴、悠悠流淌的溪床之上,让山色与石色共丽,书韵与水韵齐流。这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奇思妙构,竟出自北朝无名氏之手。汉语有“榜书”一词,原指写在宫阙门额上的大字,后泛指招牌一类的大型字。千百年来,作为书法大字的鼻祖,经石峪的石刻被代文人骚客心慕手追,赞誉之词不绝如缕。近代国学大师康有为初识经石峪时,惊叹不已,称其为“榜书第一,书法津梁”……

近些年来,我几乎遍览了北中国的名胜古迹。细检北魏的文化遗存,应该说,那遍布北中国的佛教造像,才是鲜卑族献给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千佛洞、天水积米崖、巩县石窟寺、响堂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等,均为鲜卑族石窟造像的经典之作,而大同云冈石窟,则是北魏佛像艺术皇冠上的璀璨宝石。

今年盛夏,呼伦贝尔市文联的友人约我去领略大草原、大森林的旖旎风光。期间,我和十余位文友一道,探访了一个神秘的山洞——嘎仙洞。步入这古老的山洞,我茅塞顿开,豁然贯通:一个创造了那么多美的文化符号的鲜卑族的生命之源,竟从这里流出。

今日,我要记述的一切,不仅与兴安岭大森林有关,更与呼伦贝尔大草原有关……

二

从走进呼伦贝尔这片令人心驰神往的土地的那一刻起,我仿佛是在大自然赋予的幻与真、梦与醒的感觉中度过的。它闪现在我眼前和萦绕在我脑际的,首先是一个“大”字。

静卧神州北陲的呼伦贝尔是个地级市,面积为二十五万三千平方公里,幅员

之大,是鲁、苏两省的总和,人口却仅有二百七十余万。境内有八万平方公里的天然牧场,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天然森林,三千多条河流,五百多个湖泊。那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誉为“北国碧玉”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给予我们的是大辽阔,大安闲;那被称为“中国历史幽静后院”的兴安岭大森林,给予我们的是大神秘,大幽深;那斗折蛇行的条条河流,给予我们的是大蜿蜒,大滋润;那浸润着马背民族精神的呼伦湖,给予我们的是大澄澈,大宁静;而那辉河及根河湿地,给予万千生灵的则又是大接纳,大包容……

这天一大早,我和文友们从呼伦贝尔市驱车东行,去鄂伦春自治旗访古。车刚离开市区,顷刻间便驶进了碧草连天的大草原。隔窗眺望,但见草色浓浓淡淡,起起伏伏,宛如偌大的绿色绒毯,无休止地向天边伸展。时有羊群似团团白云飘落在绿毯之上,偶见马群在葱绿的草地上踱着绅士般悠闲的步子。这脱掉尘埃之气、清逸灵透的意境,已超出了画图的色彩,而化生出人间天堂的意味。途中,我们数度恳请司机停车,以爽耳目。每每见到的是红、白、黄、蓝、紫的各种野花,在草丛里掩映着,在阳光里闪亮着,在微风里绽放着,在蜂蝶轻轻地亲吻下羞晕着。香草在我们的膝边,薰风在我们的脸上,微笑在我们的周围。没有拘束,没有猜忌,没有讥刻,没有督饬,这里留给我们的是放松心灵中的永难抹去的绿的记忆。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行程,大兴安岭的万顷苍翠,涌入了我们的眼帘。大兴安岭北起黑龙江漠河县,南至内蒙古赤峰市,南北长一千四百公里,东西宽三百公里,其百分之八十多的林区面积在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与亚马逊雨林,并称为地球上的两大肺叶。一扑进大兴安岭那阔茫茫、气滔滔的怀抱,我顿生千

岭结一绿,世外疑无天的喟叹。大兴安岭林区里,有大小河流七千一百余条,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山缠水绕,水山相亲。

“天地之大德,曰生。”正是地母以她的宽厚和仁慈托起了高高的兴安岭,并以她乳汁饱满的胸脯,孕育着这里的“生”,滋哺着这里的“长”,展示着这里的“茂”,高擎着这里的“美”!

车子在林区的土路上跳荡着。我们在澹澹河溪叠叠岭,蓝蓝湖色青青山的林海里穿行着……日暮时分,我们才住进了大兴安岭东麓的一家林区宾馆。

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和大森林,共同谱写了一卷卷游牧民族的充满激情和戏剧性的叙事诗。开国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大兴安岭森林,是人类早期的栖息地之一,是东胡、鲜卑、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众多马背民族的生命源头。

“鲜卑”作为一个民族称谓,意为生活在森林里的百姓。在蒙语中,“鲜卑”和“室韦”也为森林之意。“鲜卑”一名,最早见于周初。《国语·晋语八》中,有周成王在今宝鸡市的岐山会盟天下诸侯时,不屑和南面之荆蛮、北方之鲜卑为盟的只言片语的记载。成稿于公元554年的《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记述马背民族创建的封建王朝的正史。《魏书·序纪》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大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掌国时的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拓跋鲜卑祖先的老邻居——乌洛侯国,遣使朝贡时禀奏:乌洛侯国西北,拓跋先祖的旧墟石室,保存完好,“室有神灵,民多祈请”……拓跋焘闻奏,即派中书侍郎李敞,率队从代京平城(今大同市)出发,北行四千里,来到乌洛侯国使者所言之“石室”,以马、牛、羊为牺牲,告

祭天地,并将“祝文”刻于石室之壁。此举在《魏书》的纪、传、志中均有记载。《魏书》不仅誊录了石刻“祝文”的全文,且将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的空间大小,也笔录得颇为翔实。然而,大鲜卑山位于北疆何域,石室又藏在哪座山岭?千百年来,却一直是史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历史的经纬纬里,总是沉潜着若干神秘;有时候,历史最精彩的笺页,往往匿藏得很深很深。自北宋以降,修史者对《魏书》中的“旧墟石室(亦称石庙)”的记载,凭主观臆断,多有修改。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避开“石室”之谓,屡称“旧墟”为“石庙”。宋人王钦若等辈所编的《册府元龟》一书中,数黑论黄,竟将《魏书》中“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改为“石室南距岱宗可四千余里”。这将“大同”变为“泰山”的篡改,虽两字之易,却谬以千里。后来,有人把大鲜卑山推定为燕山;有人则认为大鲜卑山不过是神话传说之山,难定其真实位置,可谓以讹传讹,三纸无驴……

惟坚忍者方能遂其志。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米文平,便痴迷于对拓跋鲜卑的“石室”及“祝文”石刻的寻找。他曾费时余年,查访了呼伦贝尔域内的诸多山洞,均因与《魏书》记载之“石室”不符而告返。1979年盛夏,米文平偶闻鄂伦春自治旗境内有一嘎仙洞,便抱一线希望,前来探究。见洞之规模,与《魏书》记述凿枘相应,遂喜出望外。然而,考古毕竟是将结论建立在实据上的学问。米文平三探嘎仙洞,仍未觅见“祝文”之踪影。有“石室”而不见“祝文”,无疑是劳而无功,苗而不秀。1980年7月29日,他率同行四进嘎仙洞,终在石壁的苔垢下发现一凹痕,经洗苔除垢后,北魏“祝文”惊现于世。如同虎符的一半与另一半得到了对接,一个千古历史谜题,终于破解!

继而,米文平又带人对洞内的泥土进行挖掘,先是见到了一千五百余年前,北魏人刻石时所遗下的花岗岩碎片,再行开掘,除发现了獐、狍、狍、鹿、野猪、黑熊的众多兽骨外,还发现了大批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又印证了《魏书》所记的拓跋氏在大鲜卑山积“六十七世”之言,绝非无妄之说。

嘎仙洞石刻祝文的“显身”石破天惊,它向世人宣示,嘎仙洞就是鲜卑人先祖的“旧墟石室”,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

我这次来大兴安岭的首要目的,就是去探访嘎仙洞。我和文友们从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阿里河镇出发,乘车沿嘎仙河边狭窄的柏油路,向西北方向而行,只见河两岸高林巨树,遮天蔽日,悬葛垂藤,绕岩挂石。不到半个小时,车子便在浓密的树荫下停了下来。举目仰望,但见一巍然高耸、陡似斧削的悬崖,矗立于浩茫的原始森林之中。悬崖的石壁上,赫赫然有一宛若三角形的巨大洞口,这便是我心仪已久的嘎仙洞了。沿人工铺凿的石阶登攀而上,进得洞中,我神情为之一振。这天然山洞,深达一百余米,宽近三十米,高有二十余米;穹顶高旷,浑然天成,石壁平直,细滑如切。看上去,古意苍苍,威严肃穆。

北魏石刻镌于洞内西侧的石壁上,刻辞十九行,全文二〇一字。这颂扬拓跋先祖功德,祈祷皇天之神护佑鲜卑子孙福祿永延的祝文,字大如拳,古朴刚劲。字里行间,折射出一种玄奥、雍容的宫廷气象。

我紧靠着护栏,久久凝视着栏内石壁上的祝文。嘎仙洞祝文的“惊艳”于世,除印证史实外,最关键的是,大鲜卑山地理方位的确定,不仅校正了北国历史地理上的几处谬误,厘清了历史地理上的一些疑团,而且还为后人研究游牧民族的地缘、天缘、人缘和

风神脉息,提供了一个向四周辐射的基准点。从这多重意义上讲,嘎仙洞的祝文,作为马背民族的第一份石刻原始档案,和璧隋珠不足方其珍,凤毛麟角无以喻其贵!

嘎仙洞是鲜卑民族最古老、最真实的历史证人。它曾见证过一个坚忍的民族,是怎样面对凶兽的觊觎、蛇虫的叮咬,不畏雷霆的炸响,不惧雪暴的肆虐,一代又一代顽强生存的。它也见证了一个无畏的民族,是怎样以强烈的求生意识,在部落首领推寅的率领下,让那似马非马、似牛非牛的森林“神兽”——驯鹿,驮着兽皮,驮着桦皮制作的生活器皿,驮着老人,驮着稚童,驮着渡河用的桦木舟,西迁,西迁,南行,南行,奔向呼伦湖畔,奔向大草原……

三

人是自然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常是地理与环境的文化。这正如宽广时可响遏行云,绵长时如旋雪回风,婉转时可余音不绝的蒙古民歌长调一样,它只能生在呼伦贝尔这样的大草原上。

近二十余年来,我曾四次走进大兴安岭;在造访我中蒙、中俄边防部队时,也曾三度穿越呼伦贝尔草原。我没有浪漫诗人的灵感,也不具备菩萨的慧眼,但在领略了呼伦贝尔四季之美景后,也不由一次次感叹上苍造物之诡谲万象。

没有百鸟之鸣唱,珍禽之争翔,就不是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那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湿地,是天鹅、灰鹤、银鸥、鸿雁、丹顶鹤、蓑羽鹤、白琵鹭等诸多候鸟北徙南迁的重要驿站。仲春时节,我曾在辉河湿地和乌兰诺尔湖,观赏过万鸟云集的盛景。那一群群周身洁白的天鹅,舒展着翅羽,在幽蓝的湖上,时

而高翔,时而低回,时而在碧波中一起一伏,像一艘艘游弋的小白船;那头顶着丹霞般耀眼红球的丹顶鹤们,则收敛起雪白的蓑毛,举着赤色的长喙,像饱学之士一样,在湖边踱着优雅的步伐,而靛蓝的湖泊,仿佛是上苍为它们精心设计的镜匣;那颈项或白或黑,脑后翘着小辫样羽翎的蓑羽鹤,站立时只觉得它那流线型的身躯黑白分明,飞翔时却能望见它的躯体竟是红、黄、蓝、白、黑五彩纷呈……这些天地间美的精灵,它们的每一根骨骼,每一节肢体,每一条筋脉,每一片羽毛,无一不贯穿着宇宙间的丰沛活力,是呼伦贝尔肥美的水草与邈远的天空,给它们提供了自由生存的机会,也赋予了它们远行万里的定力、耐力及明察天候的神异。

没有繁花似锦,也不是呼伦贝尔。

北国杜鹃是呼伦贝尔的市花。暮春时节,在大兴安岭最长最深的神指峡里,那胭红、金红、橘红、猩红、绯红的杜鹃花,于这峡谷两岸的河边岩旁,壁缝石隙,林中树下,一齐绽蕾怒放。微风徐来,像陈酿一样馥郁的香味,飘洒在空气中,曾令我深深陶醉。这样的场景,在呼伦贝尔的每座山岭的苍松白桦间,会随处可见。北国杜鹃,擎出的是一则则古老而馨香的故事。呼伦贝尔从春到秋,花事不断。翠雀、瞿麦、柳兰、紫菀、毛菊、芍药、山丹、刺玫、苞鸢尾、山丁子、金芙蓉、梅花草、野罌粟、天蓝苜蓿……争芳竞艳,应时开放。这些身着各款“时装”、千娇百媚的“小娘子”们,受了碧水清溪的润泽,受了晶亮甘露的涵濡,受了明丽阳光的温慰,她们即使不能放声曼歌,也要在轻柔的风中欣欣摇曳,也要把襟底怀中的清香,尽情吐泄。她们仿佛要把马背民族那几百阙的情词哀曲,融汇于胸中。

没有百草之吐翡铺翠,还不是呼伦贝

尔。

“海拉尔”在蒙语中意为“野韭菜”。海拉尔现为呼伦贝尔市府所在地。它辖区内的草原,凡最翠绿之地,必然生有茎肥叶厚的野韭菜。它们比肩争头,攒攒挤挤,密密连连。我对羊肉并无偏爱,但每次来北国草原,总感到这里的羊肉,吃来不膻不腻,其香郁郁,其味馥馥,一羊上桌百味淡,我常是尽情饕餮,大快朵颐。当地文友告诉我,这是因羊常食野韭所致。在这草原上,野韭虽为寻常之草,但它们却以爱美、爱色、爱香的群体烈情,成为百草中的主宰。每届盛夏,那雪白、月白、露白的野韭菜花结成的花海,成喷涌之势,铺展到无涯的天边。进得野韭丛中,你便会觉得,野韭以黛绿作为永远一致的符号,以银白作为永远统一的头饰,去集体展示生命原力的内动,以实现群体生命的彻底痛快。

没有冰雕玉砌的大洁白,仍不是呼伦贝尔。

严冬时节,那一场场大雪,是呼伦贝尔向世界发出的圣洁的敦请和邀约。我曾在大雪过后,目睹过这里森林与草原的雪景。但见山若玉雕,石似晶铸,粉塑千桦,银裹万松;它们与大草原一望无垠的雪野连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童话般的银色大天堂。雪的母性般的宁静与端庄,柔软与纯净,磊落与厚重,使我领悟到“精神澡雪”的意蕴。雪国的大洁白,以诗意般的沉默,赐予人们诗意般的思索。希冀、渴望、追恋、向往,是一切生命的本质。奇寒酷冷,并没有降落万物生命的帆篷,而是更加强劲了它们的筋骨。在我眼里,那舞雪举翠的樟子树,那挂银盔、披银甲的兴安松,则像蓄势待发的士兵,在静静等待生命冲锋的号示……

我从介绍呼伦贝尔的有关资料上得知,在距今二至三万年前,呼伦湖畔即有古

人类活动。呼伦贝尔的草原与森林里,至今仍有三千多种野生植物和四百多种野生动物。我们完全可以说,呼伦贝尔几乎包容了大自然的所有色彩,也收藏了人类历史与生命进程的所有符号。

今天,走进呼伦贝尔的人们,多以审美的目光,来观赏这里的山川风物与民族风情。而两千多年前,拓跋鲜卑从密林深处的嘎仙洞迁徙到这大草原,则完全是为了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壮大。

人类的先祖,在一个地方留下的物体或痕迹,常会成为今人解读这一方民族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向导。从呼伦贝尔草原上发掘出的大批墓葬和文物可以印证,拓跋鲜卑大约是在公元前五十至五年迁来这大草原的。他们大约在这里生活了七代。在那近二百年的时光里,拓跋鲜卑渐次完成了从狩猎民族到游牧民族的转换。

因鲜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入主中原前,拓跋氏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全靠代代严谨的口传心授。他们当时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生活境况,史少记载。但我们仍可调动丰富的想象力,去再现他们的部分生存场景。

逐水草而牧、大量繁殖的马、牛、羊,其肉其皮其毛其乳,可使鲜卑氏衣食有着。那饱食百草的壮牛和常啃野韭的肥羊,被宰杀、炙烤后,会让鲜卑人吃得两腮鼓鼓,口角生香;那鲜美的牛乳、羊奶和浓稠的奶酪,能让拓跋孩童胖嘟嘟的脸庞吹弹可破,也能使鲜卑汉子脸泛红光;那湖泊河流中捕捉不尽的活鱼跳虾,强化着一个民族的体魄与智慧;那与中原通商换得的美酒及自酿的马奶酒和野果酒,勃发着一个民族的剽悍与豪气;那大泽中天鹅与丹顶鹤仙子般的情影,岁岁会给他们带来美的惊喜;白云下百鸟的和鸣,是上苍送给他们的天

外音响,草原上的百花,可让拓跋少女任意编织戴在头上的花环;大雪后的大原野,则又是鲜卑少年强身习武的大校场……

从有“森林之舟”美誉的驯鹿的脊背,骗上蒙古马的雕花马鞍,是拓跋鲜卑走向历史大舞台的最关键的跨越。

在世界文明史上,人类对马的征服,是一次最高贵的征服。历史跨上马背,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跨越,马也成了冷兵器时代速度的象征。

蒙古马是大自然的杰作。英雄史诗《江格尔》中曾这样深情地赞美它:“如同离弦的箭一样快,像火花似的闪耀,气势磅礴……把那公牛和大象吓得心惊胆战。人们一看那漫天的红尘,就知道是阿兰扎尔神驹来临。”蒙古马体格虽小,但头大颈短,体魄强健,胸宽鬃长,皮厚毛粗,耐寒,耐劳,耐热,站着便能入睡。它虽有着扬蹄能击碎狐狼脑壳的凶悍,但对主人却俯首帖耳,忠心耿耿。成吉思汗曾把战马训练得“千马为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系控,亦不走逸。”呼伦贝尔经过改良的蒙古马——三河马,至今仍是唯一可与欧美马争雄的国产马。上世纪三十年代,三河马曾在上海国际赛马大会上,以最快的速度,力挫群雄,拔得头筹。

历史上,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征战,基本是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的战争。在秦汉时,将北方各大游牧部落统一了的匈奴,一直是荷锄民族心中最大的痛。西汉初年,在著名的“白登山之战”中,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冒顿单于率领的四十万骑兵,围困于今山西大同市的来掠山,达七天之久。汉军以重金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即王后)行贿,方得以救驾。当时匈奴的四十万骑兵,竟能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南面全为红马,北面皆为黑骏,西面均为白驹,东面悉为青骥。那其势汹汹,其马济济的浩大场面,诠释着当时匈奴畜牧业的高度发达和驭马本

领的炉火纯青。匈奴就是凭着“所向无所阔,万里可横行”、“怒行追疾风,忽忽跨九州”的蒙古马,不断对荷锄民族进行着不图占领,只为掠掳之战争的。匈奴人竟有这样的奖掖“条例”:“凡斩得首虏者赐一卮酒,所抢掠财物归抢者所有,掠得的人口作为其奴婢。”秦嬴政修筑的万里长城,关锁不住蒙古马那奔星般飞扬的马蹄;汉军戍边将士的短刃长戈,也抵挡不了匈奴人那呼啸飞卷的狼旗马鞭。中原被大劫后的集镇茅舍,常是一片狼烟野火;塞外的王廷牙帐里,则是征服者的狂饮与狞笑……

面对匈奴铁骑恣行无忌的烧杀抢掠,刘汉王朝靠宫中的美姝丽媛与匈奴的和亲之策,只能求得短暂的绥靖。汉武帝举全国之力,数度重创匈奴,也只能换取几十载的和平。

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匈奴内部发生“五单于争位”,匈奴的势力才大为削弱。后虽有王昭君的夫君呼韩邪单于率部臣汉,而漠北之匈奴却仍像草原野韭一样,割了此茬,又生彼茬。直到东汉和帝时,又几番重挫匈奴,方使得部分匈奴西去欧洲,部分匈奴南归中原……

在人性色彩的板块上,永不满足的欲望是重要的色块。它既能支配生命的动机和力量,也是幻想未来的刺激素。华夏民族同匈奴掠夺与反掠夺的号角乍歇,北方另一马背民族——鲜卑,驰驱中原的金鼓又鸣。由拓跋、慕容、宇文等诸多部落组成的鲜卑民族,随着匈奴的桑落瓦解,便乘虚而入,尽占匈奴故地。

拓跋鲜卑自嘎仙洞一带迁居呼伦贝尔大草原后,经过七代人的养精蓄锐,势力已空前壮大。这期间,他们早就以草原雄鹰一样高远而犀利的目光,瞄向了中原那较之游牧经济高着一个等级的农耕文明。追求

新颖、渴望舒适、期盼富有,是人类通有的情愫。当鲜卑的首领们,觉察到自己那夏闷冬寒的流动毡房,怎么也比不上中原雕梁画栋的殿堂和向阳敞亮的茅舍时;当他们看到自己那用灰褐色粗糙的兽皮制成的衣物,怎么也比不上中原绸缎的光鲜亮丽时;当他们觉得自己那用桦皮制作和泥土烧制的器皿,怎么也比不上汉人的金杯银盏和木制漆器精美讲究时;当他们感到毡房外夜间的狐鸣狼嚎,更不能与中原之华堂里、戏台上的丝竹笙歌同日而语时……焉能不怦然心动,见异思迁,图谋中原!

于是,鲜卑人一路西迁南下,历经九难八阻,历时一百余载,先吉林,而赤峰,而乌兰察布,而包头……当拓跋首领子微定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时,其所部已“控弦骑士达二十余万”,初步具备了与北方其他游牧部落争雄的能力。

于是,拓跋鲜卑人以呼伦贝尔大草原赋予的大视野,带着大兴安岭森林的充沛元气,带着呼伦湖候鸟迁徙时的颖异,带着碧草百花一样的灵性,也带着草原狐的狡黠、大漠狼的凶狠,跨上纵鬃扬尾的蒙古马,去不断进行力的征服,美的创造!

四

杰出的英雄人物,常是改写历史的一个符号,一个指数。北魏王朝所以能结束“五胡十六国”长达一百三十多年昏天黑地的大割据,是因为出了开国皇帝拓跋珪和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这两位上马会打仗、下马可安邦的豪杰。

拓跋珪的祖父什翼犍在盛乐建立代国不久,即被氏族创建的前秦所灭。幼年丧国丧父的拓跋珪,其童年是在匈奴贺兰部的舅舅家度过的。其时的北中国,攻伐与战乱

是上演不尽的剧目;颠沛与苦难是百姓吞食不尽的涩果。公元386年暮冬,失散的拓跋各部落头领会聚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一致拥戴年方十五岁的拓跋珪继承代王之位。同年,他率部族从牛川重迁故都盛乐,并改国号为北魏。

其时的北魏,南有独孤部,北有贺兰部,东有库莫奚部,西有铁弗部,阴山以北还有高车部及柔然部,可谓四面多垒,虎视狼窥。聪颖异常、心雄万夫的拓跋珪,在拓跋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发出了铿锵有力、铮铮有声的决定性呼唤。公元387年仲秋,他联合鲜卑慕容氏的后燕,击溃了占据山西北部匈奴刘显部,将河套以东的大草原尽归拓跋;公元388年盛夏,他亲率士饱马腾的队伍,东征库莫奚部于落水(今赤峰一带),使大片土地为北魏所统。公元389至390年,拓跋珪率军先破高车部,又平吐突麟部,再伐贺兰部,并将塞北的纥突、纥奚等多个游牧部落,尽属北魏。

“若建非常之功,需待非常之人。”在“五胡十六国”时,仍以狼为楷模、仿效狼的群体攻击且贪欲永不满足的匈奴后裔所建的几个政权,一直是拓跋珪的心腹大患。为御虎狼之师于国门之外,公元391年初冬,拓跋珪主动向漠北的匈奴别种柔然出击。面对屡战屡胜的北魏骑兵,柔然从游牧地狼山西逃,拓跋珪西奔六百里,进行大追击。此时,部将以粮草难继为由,建议暂且偃旗息鼓。拓跋珪率骑兵征战,每人至少配正、副两匹战马,轮番换乘,马歇人不歇。拓跋珪果断决定,杀副马为食,又打马追风,率部狂奔三日,终在大戈壁的南床山下追上柔然部众,将其分割包围,杀得柔然一败如水,鱼溃鸟散。此大捷,使柔然大部将士或倒戈卸甲,或俯首就擒,魏军获牛羊、军资无数。

拓跋珪在击败柔然南返途中,匈奴铁弗

部刘卫宸遣其长子直力鞬,率九万兵马进犯魏国南部。拓跋珪闻警,仅率五千精骑及部分輜重车辆,星夜赶到后,即被直力鞬的九万大军围得水泄不通。久经战阵的拓跋珪了无惧色,急令部下以车身为屏,结成方阵,从缝隙中射杀匈奴骑兵。经几番箭矢如雨的拼杀,直力鞬的九万兵马溃不成军。拓跋珪兵不歇刃,马不离鞍,以破竹之势,直捣铁弗部的大本营悦跋城(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一带)。魏军后续部队火速赶来后,刘卫宸父子闻讯仓皇弃城而逃,拓跋珪分遣轻骑紧追不舍,生擒直力鞬,刘卫宸也为部下所杀。刘氏父子的余党五千余人逃至盐池(今属宁夏),亦被紧紧追赶的魏军全部投尸黄河。此役,北魏获战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成为以“驯鹿”为图腾的鲜卑民族敢于以少胜多,全歼以“狼”为旗帜的匈奴强敌的典型战例。

统帅有狮子般的雄心,士卒就有咆哮的勇气;统帅胸有良谋、腹藏吞吐天地之气,士卒就会迸发出所向披靡的力量。时光跨入公元395年,能与拓跋鲜卑在北中国争雄者,只有慕容鲜卑建立的后燕王国。同年五月,后燕的开国皇帝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率兵八万出中山(今河北定县)北进,抵近五原(今包头)时,大造船只,欲渡黄河与魏军决战。慕容宝所领部队虽少,但均为人马披甲的重装骑兵与步兵,且极富作战经验。北魏军队虽多,但大都为轻装骑兵,与后燕铁军正面对抗,胜算无多。拓跋珪以逸待劳,避实就虚,暗将精锐部队匿藏于河套一带,使慕容宝百余天都觅不到魏军主力的踪影。期间,拓跋珪屡派斥侯(侦察兵)擒获燕主信使,切断慕容宝与燕都的一切联络,并广散年逾七十的燕主已病亡的假讯,动摇燕军军心。急于继位的慕容宝难辨消息真假,便焚烧渡船,率燕军且防且退。是年十一月初三,风雪骤降,黄河冰封。藏

器待时的拓跋珪,亲率两万精骑,连夜踏冰过河,在参合坡(今内蒙古凉城一带)将睡梦中的燕军包围。慕容宝在部属护围下逃走,五万燕军束手被俘……

翌年深秋,拓跋珪趁慕容垂新死、后燕内乱之机,以“司马九伐”之威,率四十万大军伐燕。魏军多路出击,马嘶旌飘,绵延两千余里。在这长达一年的战役中,魏军分兵攻城略地,将后燕领土悉数占领,把晋、冀、鲁、豫的大部土地,划入北魏版图。

十年征战,拓跋珪将呼伦贝尔大森林与大草原赋予给鲜卑民族的刚毅、奔放、神勇、机警与豪烈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作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马背民族,如何得到荷锄民族的认可,进而得到拥护,这是比打天下还难上百倍的历史大课题。所幸的是,拓跋珪以草原一样的大胸襟、大包容,向历史交上了一份颇为合格的答卷。

与秦汉时以掳掠为业的匈奴不同,跻身农耕文明,是鲜卑族多少代人的梦寐以求。拓跋珪对夺得的中华半壁江山,自会分外珍惜。

拓跋珪自幼就攻读汉家兵书与历史。戎马倥偬中,对汉人的典章、制度、语言、文化及风俗也多有涉猎。为更好地掌控中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北魏的国都由盛乐迁至战略要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他让跟随多年的朝中汉臣,将长安、洛阳、邺城等历代皇都的设计蓝图,一一寻来,萃新奇,熔精华,建起了像中原王朝一样的宫殿楼阁、园林亭台,并立下新皇登基必祭黄陵、拜孔子的规矩。马背民族“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所频发的豆萁相煎、弑父杀兄的史实,让拓跋珪想来不寒而栗。与汉廷的传位规则两相考量,拓跋珪决计实行汉人“立太子”之制。汉武帝暮年确立宠妃钩弋所生的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时,怕钩弋成为吕后第二,便赐死了钩弋。拓跋珪邯郸

学步,竟将汉武帝这非常时期的一时之举,定为北魏王朝代代必遵的金科玉律。

为富民强国,也为了加速鲜卑人的汉化,拓跋珪强势推行屯田制。他将战争中所掳的游牧部落的牧人改为农民,让他们到大片荒芜的土地上从事农耕。这等于国家办了无数个小农场。由于分配时注意向农人倾斜,大大消弭了归顺者的国灭之恨。他还把京郊附近的地片,划为“畿田”,由皇室直接管理,并亲自到“畿田”参与劳作与督导。他多次下诏,强制解散靠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鲜卑部落组织,分地分土让他们定居,或从事农耕,或在分得的地片里放牧。此重大变革,加速了鲜卑人由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这一切举措的实施,不仅使众多平民衣食有着,也强化了国力,为北魏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不断壮大,夯下了坚实的台基。

公元424年,拓跋珪的孙子拓跋焘继位,成为北魏第三代皇帝。他初登龙墩,柔然首领大檀,便趁北魏第二代国君拓跋嗣新丧,统骑兵六万,入侵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年仅十六岁的拓跋焘御驾亲征,率骑兵日驰夜奔,三天两夜即赶到交战地。魏军未及休整,就被柔然的兵马,里里外外围了五十多重。拓跋焘挥军布阵,镇定自若,首先射杀了前敌先锋将帅,柔然兵马大乱。拓跋焘一马当先,冲向敌群,柔然大败亏输……首战奏凯,尽显少年天子卓越的军事才能。匈奴铁弗部,曾被拓跋珪几近斩草除根。当时,仅有首领刘卫辰的小儿子刘勃勃只身独骑逃走。勃勃投奔了后秦高平公没于突,并成了没于突的乘龙快婿。勃勃兵权在握后,凶残地杀死其岳父,借后秦之尸还刘氏之魂,在统万城(今陕北靖边)建立夏国。统万城在拓跋焘时,早已大名鼎鼎。其城墙既高且宽,用石灰、白黏土、糯米汁搅拌夯

筑,有崤函之固。欲破此城,夏夏其难。公元427年,拓跋焘率轻骑三万,长途奔袭,突现统万城下。他采用声东击西、引蛇出洞的战术,终使城中夏军出城,落于魏军布下的口袋阵。夏兵大溃,夏主赫连昌(刘勃勃次子)率残部弃城而逃……

拓跋焘即位后,匈奴后裔柔然,又成为东起外兴安岭,西逾阿尔泰山,南到外蒙大漠,北至贝加尔湖的强大游牧国家,对北魏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公元429年春,拓跋焘发动了他称帝后最大一次对柔然的主动出击。其时,柔然无备,民畜遍野。魏军云盔雾甲,如天兵飞降,柔然措手不及,仓促烧毁帐舍,慌不择路,狼奔豕突。拓跋焘兵分数路,飞马急追,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的大漠和草原上,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捕,使得柔然三十万户牧民归降北魏,敕勒部(即高车部)亦有三十万人投降拓跋焘。拓跋焘将这些降顺的部落,迁至漠南几千里的北魏边境,在魏军监督之下,从事农耕和畜牧,岁岁向拓跋皇廷交贡纳税。继而,拓跋焘又东征辽海,平定北燕;西出秦陇,翦灭西凉……在这一连串的征战中,拓跋焘与其祖父拓跋珪一样,将奔袭战、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攻坚战、歼灭战,演绎得出神入化,使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马背民族创建的饮马长江的王朝。

拓跋焘一统北中国后,偃兵息武,大倡文治。比其祖辈、父辈,益发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在选贤任能时,他对有大略者不问种族,有大才者不分贵贱。他多次下诏,征选遗落稗野民间的逸士。当他得知一些州郡官员,在延揽人才时,有胁迫行为,又再下敕令,告诫群臣,对征召士子,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受拓跋焘惜才、爱才诚意之感召,通晓经义的学者,文章冠世的名儒,纷纷来到平城。拓跋焘对北魏所灭诸国中的

汉族官吏,不计前嫌,量才录用;他对从南朝归顺而来的廊庙之才,更是青眼有加,委以重任。斯时,南朝刘宋皇室,见北魏良将如雨,谋士如云,常使反间计,图谋造成北魏君臣失和。拓跋焘以过人的明察和任人不疑的胆识,数次戳穿了南朝谋士的鬼蜮伎俩。这就使得在南朝有志难伸的高人介士,驥子龙文,纷纷越江而来,汇聚北魏。对此,北魏高允曾写下《高士颂》,以志其盛。

拓跋焘早就意识到,只有提升鲜卑官员的汉化水准,才是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为拓展汉语的表达功能和书写领域,他令朝中汉臣新造汉字千余,经他一一审定后,诏布天下。他在北讨南征时,即在京城郊办起太学,让鲜卑子弟,研读汉族经史,学习儒家文化。

拓跋焘在生活上远避奢靡浮华,衣不多备,食不多味,行不多车马,要求后宫也要节衣食,俭财用,禁侈泰。他赏罚严明,对为国尽力尽忠者,不论是士卒还是官员,多有赏赐;而对外戚内亲,从不多赐额外财物。朝中权臣,曾多次上谏拓跋焘修缮扩建皇宫,以彰天子威仪。拓跋焘以夏都统万城虽皇宫豪华、城墙坚固却被本朝所陷为例,严辞驳回权臣奏章。他即位不久,便按农户贫富程度,诏令富裕户照常纳赋,中等户免赋两年,贫困户免赋三年。在审定朝臣制定的法律时,凡不利百姓之处,他下令一一删改……

凡此种种,使马背民族与荷锄民族的融合,很快闪出了一抹亮眼的曙色。

乱世造就了拓跋珪,历史选择了拓跋焘。这祖孙二人在北中国山川大地上留下的刻痕,早被岁月久久地尘封,鲜为今人所知。但这些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旧事轶闻,却仍能与时间抗衡,成为当今的鉴诫,后世的教训。

五

皇后作为封建帝王的嫡妻,凭借着香宫贵位,隔一帘纱幕,在中国历史上编织出了多少或悱恻或缠绵或凄美或残忍的故事。由于封建史家的大汉族情结及大男权主义,对北魏参政一朝、摄政两代的冯太后,鲜有提及,甚至连她的雅名芳字也给隐去。然而,论及冯太后其德其才其智其绩,都远远高过在历史上大出风头的汉吕后、唐武后、清慈禧者流。这位不被史家看重的冯太后,却是北魏中兴的真正的“总设计师”。正是她,在北魏江山社稷的画稿上,硬黄匀碧,尽情挥洒,写下了标新立异、恢宏隽妙的画卷。

冯氏祖籍河北,生于长安。祖父曾是“十六国”时的北燕国君,父亲曾为北燕广平公。拓跋焘平燕时,冯氏的祖父为停战言和,屈将冯氏仪态绝丽的姑母献给北魏后宫,成为拓跋焘的昭仪。幼年的冯氏,失母丧父,便被姑母带进宫中。冯昭仪对侄女呵护备至,五经四书,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宫廷礼仪,无不悉数传授。冯氏冰雪聪明,口不绝吟,很快便以容貌靓丽,顾影合度,温文尔雅,成为宫中的“小明星”。公元452年,十三岁的拓跋濬即位,成为北魏第五代皇帝。冯氏十一岁便被封为贵妃,十四岁时,她艳压群芳,“美”挫另外三位竞选对手,成为拓跋濬的皇后。

拓跋濬登基前,宫中宦官宗爱,在八个月内连弑拓跋焘、拓跋余两帝,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幸有忠于魏室的几位大臣,诛杀了宗爱,方稳定了朝局。冯氏立为正宫后,便同十六岁的拓跋濬鸾凤和鸣,共克时艰,采取宽刑简政、与民生息等安国之策,渐次使北魏物阜民康。正当这对琴瑟和谐的帝、后,欲大展强国富民的抱负之时,天不假年,

年仅二十六岁的拓跋濬,竟驾崩于平城。

按拓跋葬仪风俗,国丧三日那天,皇帝生前所御用器物,要在陵前全部焚烧。失君之痛,令冯皇后肝肠寸断,不能自持。她挣脱搀扶的宫女,纵身一跃,投进熊熊烈焰之中。太监们手疾眼快,速把皇后救起,才使得昏迷的冯氏安然脱险。

这纵火一跳,使一身素缟的冯氏,在鲜卑人的心目中,俨然成了浴火重生的凤凰、圣洁无比的天鹅。

这纵火一跳,不仅使冯氏这位汉家女,在满朝文武心目中的形象愈发高大;她以死殉夫的忠贞,也在民间传为美谈。

拓跋濬称帝后第四年,立两岁的拓跋弘为太子。根据开国皇帝拓跋珪立下的“子贵母死”的规矩,太子的生母李夫人即被赐死。拓跋濬便让他极为信赖的皇后冯氏,抚养太子弘。母亲是伞,是豆荚儿,稚童是伞下的宝贝,是荚里的金豆儿。冯氏对拓跋弘精心鞠育,恩同再造。从另一个角度说,冯氏取得了太子的抚养权,也就等于为她竖起一架攀上北魏权力峰巅的天梯。拓跋弘继位时,仅有十二岁。前朝权可倾国的大将军乙浑,觉皇上年幼可欺,便盗用皇帝诏令,呼朋引类,肆无忌惮地诛杀异己,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弄得京都平城,一片腥风血雨。幼帝拓跋弘,只知在母后冯氏面前啼哭。是冯氏只手擎起了北魏皇权之安。为保全母子生命,冯氏先是以屈求伸,封乙浑为丞相,总揽朝政,继而又暗中笼络朝中几位耿介之臣,派兵一举将乙浑诛杀,灭其三族……

在这场捍卫皇权的角逐中,年轻的冯太后显示出过人的政治智慧,由一代佳丽变为铁腕人物。她断然从幕后走向前台,临朝听政。她重用一批治国能臣,使朝局趋向稳定。一年后,拓跋弘的长子拓跋宏出生,冯氏还政于拓跋弘,悉心鞠养皇太孙。

拓跋弘掌国初始,凡朝中疑难大事,还请母后定夺。随着羽毛渐丰,生性优柔寡断的拓跋弘,却变得自以为是。对母后的治国方略,他畏首畏尾,不予实施。冯氏对拓跋弘多次规劝、敦促乃至训斥,使他抵触情绪愈来愈大。见国事日非,头绪难理,十七岁的拓跋弘便将帝位禅让给五岁的拓跋宏,当起了太上皇。他躲进崇光宫,日夜礼佛。当冯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辅佐孝文帝拓跋宏处理朝政时,太上皇拓跋弘竟指指戳戳,时常插一杠子。朝中前尚书李欣,调相州任刺史两年间,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当他把十大车金银珠宝及细软之物运回京都平城时,激起了民变。冯氏当即将李欣打入死牢。李欣唆使其女婿向拓跋弘告密,言太皇太后冯氏,与中领军李奕有苟且之事。太上皇闻知,当即将李奕诛杀,赦免李欣。弘、欣二人密谋,要用糕点毒死冯氏。东窗事发,冯氏气得娥眉倒竖,凤眼圆睁,她果决出手,派人鸩杀了拓跋弘,再度临朝柄国。

痛苦的报酬是经验。养子反目、面首被诛的事实,告诉冯氏,不采取霹雳手段,其命运注定会重蹈覆辙。她先是将拓跋弘的左辅右弼、心腹大臣,清除殆尽;又将幼主孝文帝拓跋宏生母一族,在朝中的势力也一一肃清。与此同时,她将胞兄冯熙及两个情人王叡、李冲委以重任,将德高望重与前朝皇帝若即若离的大臣,收买拉拢过来。另外,冯氏还擢升了一批对她忠心耿耿的宦官,让他们死心塌地充当自己的鹰犬耳目……

皇冠虽仅是一顶镶金缀珠的帽子,但争夺起来,从来都是刀飞血溅。胜者必须既是猛虎又是狡狐,冯氏概莫能外。值得庆幸的是,冯氏翦异排他,绝非仅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大展她积蕴已久的政治抱负。

汉人史家在著录这段历史时,处于男权心态,对冯氏养面首一事,多有指责。历

史上,秦始皇后掖中有万名丽人的香阵,唐玄宗宫廷里有四万美媛的艳景,可史家在记述时,不过是理重事复,甚至津津乐道。其实,性爱是人类心理感受中最为敏感的神经元,是人生享受中最大的享受,人在这种感受中获得的快乐也是最大的快乐。二十四岁守寡、雪肤玉貌的冯氏,仅与二三情人宠臣,在宫闱里两情缱绻,效鱼水之欢,当在情理之中。

思危则安,思亡则存,思乱则治。太皇太后冯氏在掌控了朝局后,便展开了多层面、系统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大变革。

公元484年,她首先推行了“班禄制”。在这之前,北魏的大官小僚,仅靠战争掠夺,来满足或豪华或小康的生活。拓跋焘统一北方后,战争益少,单靠掠夺,已是短绌汲深。于是,贪污之风盛行,官员中出现了贫富悬殊的巨大反差。曾在拓跋焘朝写下《高士颂》的高允,此时已身居中书令高位,但他仍清廉自守、不饮盗泉,竟全家栖身破草房,仅靠咸盐煮青菜度日。然而,像高允这样的清官,毕竟寥若晨星,而大贪小贪却如过江之鲫。冯氏对各级官吏及皇室成员,一律按官阶定禄,统由国家发给米、帛、田户、力役等。同时,她还主持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惩贪刑法,凡贪污、勒索之财务达一匹绢绢之价值者,即判死刑……

民不富足而政权稳固的王朝,亘古未有。志存高远的冯氏,于公元485年,又在北魏紧锣密鼓地推行了“三长制”和“均田制”。

此前,北魏各地实行“宗主督护制”,宗主以“督护”地方的身份,代朝廷征收租税。这些宗主们,名义上虽自称一户,实则有三五十家,甚至多达百余家。他们瞒报户口、把应交赋税据为己有的劣行,使得国库空虚,佃民一贫如洗。加之显宦豪强广吞田产,强占山林牧场,使国家可控土地,益见

稀少;无田可耕、啼饥号寒的百姓走头无路,以武力抗争的事件,时有发生。为解黎庶于倒悬,冯氏派出大批官员,在夏收秋种时节,出人不意地于田间清查户口。在彻查人丁之后,她排除一切阻挠,雷厉风行地推行起了“三长制”: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三长制”之实行,赋役由此前所谓一户,变为真实的一家,朝廷可直接掌控,这就大大加强了北魏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

“三长制”初成,冯氏又以孝文帝的名义下达了“均田令”。均田制规定: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露田四十亩,女子减半;奴婢授田数与平民相同;一头耕牛授田三十亩,以四头为限;官员也按职位高低,授予数目不等的公田。露田、公田为粮田,所有权归国家,且根据人口、耕牛的变换情况,随时调整。另外,每个男子授桑田二十亩,女子五亩,用以种植桑、枣、榆、麻等经济作物。桑田为“世业田”,可代代相承。冯氏还采取特别优惠的政策,鼓励百姓由地少人多的“狭乡”,迁至地广人稀的“宽乡”……均田制所含纳的内容,环环相扣,细针密缕。在甘露普洒人间的同时,还尤为眷顾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

均田制的推行,使北魏的生产力像井喷一样尽情迸发。广袤的山川大地上,每一片,每一垄,都成了天下黎庶忘情恋栈的“伊甸园”。拓跋鲜卑由开国之初,学习荷锄民族田园生活的“仿本”,一下变成具有原创色彩的农业文明的“正版”。这具有全新意义的封建均田制,成为北齐、北周、隋唐的“沿用本”,历三百余载而不衰。且为以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在如何对待“农田”这个事关国运的大课题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蓝本”与“参照本”。由是观之,冯氏的均田制,无疑是中国农业文明史上的一块永

闪光华的里程碑！

一代国色安天下，锦绣心机“史”中藏。自幼饱读史书的冯氏，深谙封建王朝的覆亡，多由腐败引起，而腐败又往往从皇室内部发端，尔后上行下效，蔓延全国，最终导致政权彻底崩溃。冯氏二度柄国后，面对北魏王室及各级官员的腐败日甚一日，在推行班禄制前夕，就大造“反腐倡廉”的舆论。她以华夏历史为殷鉴，亲自为北魏王室成员，撰写了珠圆玉润，文采斐然，朗朗上口，多达三百余章的《劝戒歌》。《劝戒歌》告谕王室成员要自珍、自重、自廉、自律，守节不移，公忠体国，并将之定为皇室学馆的必读本。

冯氏儿孙辈的王室成员，在反复诵读《劝戒歌》后，尚能遵章守规，而与冯氏同辈的诸王，却对冯氏的良苦告诫，视为耳边轻风。怀朔镇将、汝阴王拓跋天赐，雍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均是冯氏之夫君拓跋濬皇帝的弟兄，这“二王”贪赃枉法，纸醉金迷，为北魏王朝的两大巨贪。冯氏派两个“专案组”，分头去彻查二王之后，将二王押回京城，欲施以极刑。朝中几位老臣再三跪请，冯氏迫不得已，才免二王一死。但在以孝文帝名义颁布的诏令中，仍列举二王十恶不赦的罪行，以儆效尤，并将二王打入囚牢，终身禁锢。时隔不久，冯氏得悉，她派出的“专案组组长”、朝中大臣阎文祖，在赴长安侦破南安王犯罪事实时，有受贿行为，便当即革去阎文祖的官职……

冯氏在这场“反腐风暴”中，对皇族中的二王尚且如此严惩，对其他贪官污吏更不手软。当她接到知情者举报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人贪污不法时，气得周身颤抖，便即刻派人去查清了他们的罪行，旋即下令处死洛侯、目辰，发配陈提。这之后，冯氏又以孝文帝的名义，下诏罢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千余

名只反小贪，不反大贪，只捉“苍蝇”，不打“老虎”的办案官员……

这一系列厉法禁、令必行、罪则治的反腐举措，使得侥幸逃脱的贪官，捻神捻鬼，睡不安枕，黑手不敢再伸，而那些本来清正的官员，益发勤政廉政，脂膏不润。

人类社会进程犹如浩浩东去的长河，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一千五百余年前，太皇太后冯氏在北魏的反腐刺贪的史实，已超越时空，她所擒拿的一批批赃官墨吏，仍如同从当今河池里捕捉的鱼鳖虾蟹一样，在我们面前活蹦乱跳。

班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和整饬吏治等全方位的大变革，使北魏很快走向鼎盛与辉煌。据《魏书》记载，太皇太后冯氏辅佐孝文帝掌国期间，“百国千城，莫不欢附”，“九州致贡，殊域来宾”，“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当时北魏辖户五百万，人口两千五百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司马迁有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太皇太后冯氏，深明“俭为德之共，奢为恶之大”的奥义。她清茶淡饭，衣不完采。她经常带着皇孙孝文帝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在均田制实施的第二年，北魏大旱，百姓望云霓而断颈，禾苗盼甘霖而折腰。冯氏在开仓赈灾的同时，下令停建朝廷的楼堂馆所，并把宫中与纺织无关的宫女，发送出宫。不久，又在宫中停止制作皇室所用的绫罗，还把宫中十分之八的衣物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箭刀钎，以及外府的大半衣物、缁布、丝纺——分发给六镇戍兵、贫民和残疾人。

冯氏见皇孙孝文帝已能不折不扣地贯彻她的治国大计，便淡出了政治舞台。这时，冯氏愈发显得宅心仁厚。她的心境像秋日的呼伦湖一样淡定、澄明；她的神态像大雪后的呼伦贝尔草原一样宁静、轻软。一天，冯氏身体欠安，需服菴闾子。御

厨因夜间失眠,误把稀粥当汤药端给了太皇太后,而且稀粥里还有一只死蜻蜓。孝文帝见状,勃然大怒,下令处死御厨。冯氏摆手制止,用筷子挑出蜻蜓,边喝粥边笑吟吟道:御厨做的这粥太香了,连小蜻蜓也飞来凑热闹……

公元490年深秋,冯氏魂归普陀,享年四十九岁。纵观冯氏刚柔并济,王霸张弛,屈辱过、哭泣过、仇恨过、挚爱过、欢笑过、开明过、光辉过的一生,会令多少男性君王自愧弗如!

孝文帝嘉给皇祖母的谥号为“文明太后”,可谓实至名归。

六

文化是个复合体。它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法律、知识、艺术、风俗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形成的习惯等等。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之根,是生生不息的灵魂与血脉。最终印证一个国家和民族伟大的,是它的文化。北魏王朝在文明太后冯氏主政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华夏文化与外域文化兼容并蓄的显著特质。

这特质集中体现在大同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上。

云冈石窟位于今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石窟五十三座,造像五万一千余尊,佛像最高者达十七点八米,动植物花纹浮雕图案,更是不可胜数。其工程之大部分,告竣于文明太后柄国期间。

公元446年,太武帝拓跋焘西征长安镇压“盖吴起义”时,发现一寺庙内,暗藏兵器,群聚淫乱,遂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太武灭佛”事件。这之后,北魏朝中,内侍宗爱

“连弑二帝”,引得朝野上下,说佛谈禅,甚嚣尘上。即位不久的文成帝拓跋濬,在皇后冯氏及大臣们的极力撙掇下,再度复兴兴佛。

公元452年,拓跋濬颁诏:凿石造佛,如我帝身。僧师与工匠于兴安初年,凿出一尊魁梧的“兴安佛像”。这尊释迦像的脸上、足上,竟各有黑痣,冥同拓跋濬面上、脚上的黑痣。这将梵宫之“梁”,换作帝王之“柱”的手段,显示出拓跋王朝过人的精神统治智慧。这种艺术上的胆略和气魄,也只有马背民族才能做得出来!

翌年,西域高僧昙曜,应诏来到平城。不久,他即被拓跋濬与皇后冯氏尊为帝师。在冯皇后的董理下,由昙曜主持,皇家又相继开凿出“昙曜五窟”(现第16至20窟)。五窟从开国皇帝拓跋珪到时任皇帝拓跋濬,一帝一窟,依次而建。每窟一石门,一石窗,外壁雕满千佛,主佛释迦牟尼像均高达十三米以上。它们或坐或立,无不假释迦牟尼之躯,雕皇帝之态,藉释迦牟尼之仪,传皇帝之神。这使云冈石窟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拓跋皇室祖庙。

这借佛之望,增帝之威的“僭越”,挣脱了中外造佛艺术的绳墨,恰恰成为鲜卑人在佛文化上的独创。那一尊尊圆髻方额、高鼻深目、眉眼细长、嘴角上翘、巨耳垂肩、身躯健硕的释迦牟尼佛像,神情既威严又可亲,气度既恢宏又睿智。在这里,释迦牟尼佛俨然成为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走来的“顶天立地奇男子,炤古腾今大丈夫!”

一切能够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它时代的本质雕刻的。昙曜五窟中的释迦牟尼佛像,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后的顶级作品。从五尊释迦牟尼佛像眉梢、嘴角上流溢出的微笑里,每个人都会有着不同的解读。我们读到的可以是,佛家那普度众生的慈悲、

亲和、怜悯与宽容 ;也可以是 ,一个从刀林剑丛中杀出的马背民族 ,在文化上的自信、自觉、独尊与高贵。这佛爱无涯和权力至上、佛光普照和皇恩浩荡的巧妙契合 ,所形成的独特风格 ,使昙曜五窟产生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

我曾两次拜谒过云冈石窟。鲜卑族对游牧文化的守望与眷恋 ,令我感慨良多。各民族的文化差异 ,是每个民族的特征和标识。舍弃这种差异 ,其文化就成了不伦不类的摹本。云冈早期开凿的石窟 ,形状与穹顶 ,均如同放大的巨型草原毡包 ,大佛释迦牟尼身着的袈裟 ,或披或袒 ,那厚重的衣纹 ,酷肖草原的毛纺织品。云冈之中、晚期开凿的佛窟 ,呼伦贝尔大森林、大草原美的元素仍随处可见。拓跋氏将有着“森林神兽”之称的驯鹿 ,铸于石窟门楣 ,让鲜卑族的图腾 ,在佛堂里占有一席之地 ;拓跋氏将挺拔修直的白桦刻于石窟立柱 ,使庄严的佛殿 ,平添了隽永秀逸的诗意。梵宫本是莲界 ,而云冈的一些石窟里 ,却将大草原上的花草点缀其间 ,使莲花的梵宫 ,益发气韵生动。鲜卑人还将佛教中“白马吻足”的故事 ,刻于佛堂明窗两壁 ,让他们刻骨铭心的爱马情怀得以细腻感人地展示。石窟里护法神鸟那折扇般的翅羽 ,飞天那翩然而翔的衣袂 ,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呼伦湖畔白天鹅、丹顶鹤们的典雅、婀娜、舒展的舞姿……

风格是思想的衣裳。鲜卑族毫不掩饰地对游牧文化的守望与眷恋 ,足以引导人们走进他们灵魂的秘境。

守望与包容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两个密友。鲜卑族在建筑云冈石窟时 ,一刻也没有忘记艺术上的兼收并蓄。文明太后冯氏主政时 ,云冈石窟汉化倾向日见明显。在洞窟形制上 ,不仅有毡包型 ,更多地出现了具有荷锄民族风格的前后殿堂式和方形中心塔

柱式。随着石窟面积的大幅增加 ,雕刻的形式及内容 ,也异彩纷呈。这些佛窟里 ,虽仍以释迦牟尼佛、菩萨为主雕 ,但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 ,及飞天、比丘、力士、金刚、伎乐天等 ,皆一一雕在殿内两侧、四壁、窟顶及由雄狮和大象驮起的廊柱上。佛经的故事 ,也多被雕在石窟各处 ,使中国传统建筑的云冈石窟 ,充满了佛国仙境的浪漫。云冈六窟之中心塔柱下的佛龛里 ,有一“九龙灌顶”的石雕。原佛经中 ,有二龙为释迦牟尼吐净水沐浴的情节 ,而在这里却变为九龙。“九”在中国为最高之数 ,“一言九鼎” ,“九五之尊” ,是皇帝常用和专用的术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佛教一进入中国即被中国化了”的说辞 ,在这里得到了确切地佐证。

最能代表云冈艺术之兼收并蓄的 ,当属第十二窟。此窟亦称音乐窟。其前室北壁上 ,伎乐天们 ,手持中原、草原、西域、中亚的各种古代乐器 ,或拨或弹或吹或奏或击或打或敲 ,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这场面 ,这情景 ,仿佛是在看不见的皇室巨手的幕后指挥下 ,共同吹奏着北魏的经济强盛曲 ,文化繁荣歌。

智慧的人类 ,为使各民族及个人的历史能彪炳千秋 ,常以文字的形式 ,或铸于铜鼎 ,或写于竹帛 ,或载于纸页 ,有的帝王甚至将自己的形象塑成金身。而从嘎仙洞石室走出来的拓跋氏 ,最钟情、最信赖的却是石头。拓跋濬在复法兴佛的诏令中曾云 :纸帛易破 ,泥塑易碎 ,金像易烁 ,唯石雕可与天地共长。云冈石窟 ,实则是一部拓跋王朝的石刻之历史 ,是“无韵之离骚”。

历史常是胜利者的自我宣传。作为胜利者和为北魏谱写出壮美华章的文明太后冯氏 ,有资格被雕于这石刻历史上。

文明太后掌国后的云冈佛像 ,一改此

前清一色男性佛像的单调,在一些雕像中,出现了女性化特征。女人,常被誉为上帝微笑的化身,没有一种力量,能比一个自信而美丽的女子的微笑,更能征服人心。这将佛像女性化的艺术变革,使云冈佛像的佛光,更能照彻人心胸中的蕴蓄,夺人魂魄。第七窟之“六美人”之佛雕,“宝相庄严,拈花带笑”,是变革后的代表作。云冈石窟,雕有多幅有关太子的佛经故事。那“姨母养育太子”的情景,仿佛不是来自佛经,而是冯氏抚养两代太子的移花接木。云冈有近四百处释迦牟尼与多宝二佛并坐的雕像,此乃暗喻文成帝拓跋濬与皇后冯氏,“二圣”共理朝政。孝文帝拓跋宏对祖母冯氏,至孝至顺,在祖母过世后,特颁诏将最豪华的第六窟命名为“佛母洞”,旨在称颂创造出“正版”农业文明的太皇太后的大功大德……

建筑与雕塑常是考量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云冈石窟,是以皇权的意志,集北魏的高僧逸士、画师国手、能工良匠,建造的国家级工程。

云冈,是今人解读北魏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艺术的石刻的“四库全书”。

云冈的全石化建筑,富丽堂皇,雍容华贵,阔阔深沉,巧夺天工,既具自然美,又富规则美;云冈的石像、石雕惊世骇俗,别树一帜,豪宕奇峭,流丽精工,是形诸于石的诗,也是形诸于佛的画。

云冈石窟,是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联袂创造的文化宝石,也是中华民族献给人类的艺术明珠!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云冈石窟的修建,引得北魏疆域内的礼佛造像,蔚成风气。各地官员及百姓,仿效皇家之举动,纷纷推陈出新,佛为我用。妻子为亡夫造佛者有之,儿子为先父造佛者有之,子孙为先祖造佛者亦有

之。一时间,竟出现了梵宫遍立,万佛争竖的景象。达官贵妇及富豪,也学着皇廷的样儿,将家族历史、个人生平,刻在石头上,一股“墓志铭”之热,也兴起于北魏……

文化的力量在于对人的心智、美学、道德的培养。倘若说文明太后冯氏董建的云冈石窟,足可以在世界美术史上永灼其华;那么在她精心启蒙、训迪、教化乃至激励、鼓舞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英主拓跋宏,该是她的最得意“作品”。

文明太后谢世后,独掌朝纲的拓跋宏,承袭了祖母的衣钵,以文治为中心,加速汉化,完全实现了鲜卑族与汉族的大融合。

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最大的举动,是于公元495年秋,将帝都从平城迁至洛阳,使这个荒废了一百七十余年的汉、晋古都,又以万象更新的姿态,矗立于中原大地。街道的宽阔,宫殿的巍峨,佛寺的华美,自不待言。那为富商大贾专划的居住区,那为雅士、艺人专辟的街道,那为酒家、茶客规置的酒肆茶楼,无不绿树掩映、错落有致。那为江南来客专建的“金陵馆”,那为东方来宾专造的“扶桑馆”,那为塞外友朋专设的“燕然馆”,那为西域睦邻专修的“崦嵫馆”,也是人到熙熙,马到攘攘。龙门石窟,也应运而生。当时的洛阳,成了亚洲文化的中心。

迁都洛阳前后,孝文帝对鲜卑族全盘汉化。他先是修订刑律,将此前斩刑犯人时“除衣裸体”、一人犯罪“株连全族”等之酷恶之法废除,接着又改官制,中央及地方一律按汉制设立文武官吏,同时取消王公贵族世袭爵位的制度。他下令废陋婚,厉禁鲜卑同姓人通婚,并亲作月下老,促成皇室子弟与汉族官员的儿女,结为姻亲;他敕令改制鲜卑服饰,无论男女,一律着汉服。他颁诏讲汉话,朝中凡三十岁以下的鲜卑官员,

“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为把汉化进行到底，他将鲜卑族的一百一十八个复音姓，全部改为汉姓，并率先垂范，将“拓跋”改为“元”，自尊元宏。于是，“丘穆陵”易为“穆”，“步六孤”易为“陆”，“独孤”易为“刘”，“贺赖”易为“贺”，“纥嵇”易为“嵇”，“尉迟”易为“尉”，“拔拔”易为“长孙”……并定魏、陆、奚、贺、桓、刘、于、长孙等八大姓为国姓，与朝中汉族崔、卢、郑、王四大姓，享受同等政治待遇。孝文帝将朝中鲜卑人的籍贯，通通改为洛阳县；同时还命令死于洛阳的鲜卑贵族，不得还葬平城……

服饰、语言乃至姓氏，是每个民族的特征和标志，是血肉关系中最亲密、最不应该泯灭的部分。孝文帝的激进改革，后人褒贬不一。鲜卑这个民族经过无以复加的汉化，最终消失，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但换一个角度看，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第一次真正的大融合，对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的意义，也不应低估。

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悠久，文明越是彬彬有礼，它风尚的诗意则会愈来愈少。要使一个民族的文化经久不衰，就必须不断给其注入新的刺激与活力。

书法，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里独有的一方仙苑；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书法在篆、隶、楷、行、草五体之外，还有一体曰“魏碑”。魏碑正是野性飞扬，悟性灵动的马背民族鲜卑人，在对汉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中诞生的。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隶楷兼备。康有为言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俊厚，五曰意态奇异，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畅，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与康齐名的梁启超，对魏碑也情有独钟，说“书法以北魏为主系，

唐为润系。”在我国现存的诸多魏碑中，以莱州的《郑道昭碑》、西安碑林中的《晖福寺碑》和孔庙的《张猛龙碑》，最享盛名。自北魏以降，历代书法大家，大都视魏碑为圭臬，经反复研摹，方自成一格。清代的书法大家赵谦之，近代的书法巨匠弘一法师、于右任，都曾师从魏碑……

胡风汉制的北魏，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不独石雕、石刻及魏碑。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歌》，至今仍是受众面最广的古民歌之一；那《木兰辞》中之“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的诗句，至今仍勃发着中华儿女的豪气。大受毛泽东激赏的郦道元的《水经注》，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江河及历史地理的经典教本，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至今仍是探究古代黄河流域农业技术的必读书。北魏还大量翻译了佛经，使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初成鼎足之势……

从呼伦贝尔大草原走出的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百四十九年。这在封建王朝的“周期律”里，寿命不算长也不算短。鲜卑族虽然消失了，但这个在中原大地上，曾留下过嘹亮歌声和矫健身影的杰出民族，是永远不会在中华史册上消失的。它的历史活着，它的文化活着。鲜卑族与汉民族，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鲜卑人，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是鲜卑人，唐代诗人元稹是鲜卑人，辽金诗人元好问也是鲜卑人……隋唐五代，有大批鲜卑人南迁成为客家人，客家人代有英杰辈出，更是不争的史实。

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助推器。北魏王朝在文化上的开放、开明与开通，为李唐王朝提供了借镜，为托起一个盛唐搭起了平台。李唐政权持汉制，取胡

风,一改秦始皇的“非秦纪皆焚”,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将少数民族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兄弟,以更广阔的襟怀,更大的包容,更全面的融合,将中华文化推向了风光无限的峰巅。

七

拜别嘎仙洞,沿着鲜卑族西迁、南下的路线,我们在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市的根河岸边驻足。它的北面、东面是大兴安岭,西南面是呼伦湖,南面是千里一碧的大草原。

呼伦贝尔,是一片何等神奇、神秘而神圣的土地啊!它既是马背民族的主要诞生地,也是游牧文化的重要输出地。

这里曾走出契丹族。契丹建立的大辽国,其疆域面积是北宋的一倍。它与北魏王朝一样,胡风汉制,在中国的经济史、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道瑰丽的风景。

这里曾走出女真族。女真人曾龙腾虎踞,掌控过大半个中国。大金国面对以奢靡拥抱着皇权、怯懦猥亵着果敢、阴谋扼杀着忠勇、淫乱侮辱着情爱的南宋,抵瑕蹈隙,发起过翻江倒海的进击。马背民族带给荷锄民族的是一声声惊雷,一个个震撼。女真人在无情冲击腐朽南宋王朝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用汉文化的儒雅,去填补本民族悻悻心灵的露缝。当时的金朝,上至帝妃,下至百官,以赋诗填词为尚。海陵王曾吟出“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豪迈诗句。金章宗和李妃于琼华岛并坐赏月时,竟也玩起汉人联对、组字的游戏,章宗口占“二人土上坐”,李妃即刻对以“孤月日边明”。章宗用两个“人”于“土”上组成“坐”字;李妃以“月”比己,以“日”喻帝,用日、月结成“明”

字……

这里诞生了有着谜一样色彩的英雄的蒙古族。呼伦湖周边的敖包山、马蹄坑、脚印湖、拴马柱、石马群、苍狼白鹿岛之自然景观,无不与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成吉思汗,连结在一起。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生于呼伦贝尔,长于呼伦贝尔。成吉思汗九岁时与他日后的皇后孛儿帖,也在呼伦贝尔赤绳系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正是以呼伦贝尔为大后方,率领着他的蒙古大军,挥动着“上帝之鞭”,像一道道闪电,似一阵阵狂飙,掠过贝加尔湖,掠过叶尼塞河,直达里海;他的马队,长啸于天山脚下,帕米尔高原;他的马队,丈量过外兴安岭的山山水水,也丈量过云南边陲的岭岭峰峰,并与南海一起高歌……当时的元朝,是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这梦幻般的谜题,曾令整个世界骇异、费解和太息。蒙古族在打开亚欧文化通道的同时,也创造了本民族的灿烂文化。长达十万行的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卷帙浩繁的《蒙古秘史》,早已被世界众多国家翻译出版。研讨这两部巨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国际性学科……

蒙古族为中华民族定都北京,举行了奠基礼。今北京北海的团城内,有一元初用整块大玉石雕成的“湊山大玉海”,至今它仍睁着巨大的玉一样眼睛,用公正、诚实的目光,见证着一座伟大城市,是怎样在荒野里诞生,于泥淖里分娩……

满族的前身是从这里走出的女真人。满族创建的大清国也曾创造出和盛唐“贞观之治”一样民富国强的“康乾盛世”。清朝鼎盛时的国土面积为一千三百八十余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内蒙赤峰、辽河流域,不断发现的“红山文化”,震

惊了中外。蛇形原龙、鹿形原龙、马形原龙，猪形玉龙的出土，宗教礼仪性的大规模的建筑群“积石冢、神女庙、石祭坛”的显现，一再确证，北国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华夏民族，同出一脉，同为炎黄子孙，同是龙的传人。

天地浮浮沉沉，春秋来来往往，朝代更替更替。以唯物史观去观照历史，自北魏以来，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的战争，是兄弟阋墙、争坐江山的争斗。在这部长长的历史连续剧里，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都曾当过权力的主角与配角。在南北朝、宋辽金时，也曾同为 A 角。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总是在割据、对立、抗衡中，最终走向统一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主题词，统一，是中华民族大发展的最牢固的基石。历史上的每次大统一，各少数民族都以一股股新鲜的血液，激活了汉民族的肌体和机能，优化了汉民族的基因和品质。今日之大同市，曾是北魏京都，辽金陪都，元朝西京，当属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金三角”地带。大同自古出美人。从北魏至明朝，大同曾出过二十五位皇后，九名嫔妃……

文化同世间的万物万有一样，也会有着诞生、发展、衰退乃至消逝的过程。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原生态的“母文化”，同中华传统文化一样古老，一样著名，后均因外族的占领和外族文化的侵蚀，渐次消亡了。中华文明何以历五千年而不衰，在呼伦贝尔这片古老的游牧文化的输出地，在当今这片仍有着四十三个民族居住的圣土上，我们似乎能找到某些答案。

崇尚天人合一，讲究和平仁爱，追求综

合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也打有安土重居、封闭自守的农耕文明的烙印。正是因为汉文化有着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使得历史上的马背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心向往之。然而，正如近亲婚姻，“其生不蕃”一样，单一的文化是不会有强大发展动力的。一种文化必须有多种异质文化的不断刺激、掺和与交糅，才能在互补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历史上，马背民族对汉民族的一次次冲击，只会像磨剑石一样，磨去的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惰性，而其剑体愈发显得光华四射。

正是五十六个民族文化差异的相互砥砺，才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谱！

呼伦贝尔的记忆，很多很多。它既是中国的记忆，也是世界的记忆。

呼伦贝尔是“中国历史的幽静后院”，也是当今我国硕果仅存的环境后院。

徜徉于根河岸畔，流连于大草原的碧草清流之间，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的名言，倏地闪现在我的脑际：“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物质丰富世界，文化设计未来。我们正处在经济迅猛发展，传统文化失忆的年代，也处在物欲横流，真善美最容易被击碎的年代。为振兴强大中华民族的国力，我们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部分，是完全必要的。但对某些国家的侵略文化、霸权文化、损他利己文化，我们应像大草原的雄鹰一样，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要守住中华文化之根！